



19位
华人教授
在德国



我们在德国当教授

德国华人教授学会 编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我们在德国当教授

德国华人教授学会 编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在德国当教授/德国华人教授学会编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307-17562-4

I. 我… II. 德… III. 随笔—作品集—世界—现代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1634 号

责任编辑:郭 静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3.375 字数:282 千字

版次: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7562-4

定价:45.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我们在德国当教授》经过三年多的策划和运作，今天终于出版问世了。这本书是我们德国华人教授学会成员献给我们自己亲爱的学会的十年生日礼物，也是我们部分成员求学海外，治学德国的个人心路历程的真情流露，同时也是我们作为海外游子对中国社会和德国社会的一个交代。我们成长在中国，成才于德国。多年来，无数的亲人，师长和朋友们在两国为我们的奋斗而祈祷，为我们的进步而祝福，现在该是时候向他们系统汇报一下我们在海外发展的情况了。

德国华人教授学会是一个按德国社团法注册于德国波恩的独立学术团体，成立于 2006 年。当年学会发起成立的时候，成员还不到 12 人。十年过去了，学会的会员人数翻了几番。2015 年底的时候，我们的 52 名会员活跃在德国 40 多所综合性大学和应用科技大学的讲坛上，任教的专业涵盖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工程技术领域的 30 多个专业。我们的学会发展之快，会员们讲授的专业如此之广，以至于不少德国同事开玩笑说，光是我们学会的成员就足以开

办一所袖珍型综合大学了。

本书是德国华人教授第一次群体亮相的正式出版物。我们是以感恩、感悟和感叹的心情来编写这本小书的。

我们感恩，是因为我们感恩于这个时代。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出国深造的机会，尤其是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改革开放初期或中国人关之后出国留学的。我们深知，是中国发展的历史机遇给我们提供了个人发展的机遇，我们是这个伟大时代的一群幸运儿。

我们感悟，是因为我们感悟到，有时候人生发展机会的降临看似充满偶发性，而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一环套一环，就看你的选择是否理性了。正如我们的前辈季羨林大师在他的《留德十年》中引用他的老师吴宓先生所说的那样，“世事纷纭果造因，错疑微似便成真”。有志于追求理想和学术的人们，理性的选择，即使有时候看上去难以琢磨，也一定会为未来的成功埋下绝妙的伏笔。

我们感叹，是因为我们感叹在全球化时代，生活水平随着科学进步不断改善的同时，一些青年人追求的人生目标越来越物质化，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越来越货币化。我们叹息在市场化的大潮流中，追求快速发家致富的人越来越多，耐得住学术研究、清贫寂寞的人越来越少。我们希望通过这本小书能给物欲横流的社会注入一丝反向清流，给青年一代学生提供一个更有意义的人生奋斗参照系。

在这里，我要代表教授学会首先感谢本书所有作者作出的辛勤努力，特别是孟立秋教授、曾安平教授和张卫奇教授，他们贡献出

宝贵的节假日统筹和编辑本书的稿件。我们还要感谢张丽侠女士在文字把关和篇幅结构设计上给我们提供的专业指导。我们也特别感谢王家耀院士。本书的出版，如果没有王院士的鼎力推荐和经费支持是难以想象的。武汉大学出版社的热心支持和质量把关，保证了本书的顺利出版，我们在此一并致谢！

辜学武

德国华人教授学会主席

2016年1月1日于波恩



目 录

- 2 孟立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 26 张卫奇：放慢脚步
- 50 辜学武：浪迹天涯，从心所欲
- 74 曾安平：天时，地利，人和——二之缘
- 98 方向凡：激情的梦想追求
- 126 蒋晓毅：幸运之旅
- 148 朱锦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 170 迟力峰：我在德国的几个朋友
- 186 梁 镛：跨中西文化、悟为学之道
- 202 侯正猛：人生自己书写

224	傅晓明：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
242	李书明：走入梦想——德国竞聘教授三部曲
264	宋 坚：体验德国
284	姜 涛：人生的三岔路口
302	曲文敏：追梦在德国——从学到教：我的留学故事
328	杨 斌：水到渠成
346	乔 伟：九十老翁笑谈人生
368	马小娟：我的德国成长之旅——跟随我心！
390	张建伟：用心融合
412	附 录
414	后 记



孟立秋：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孟立秋（1963年10月—），女，江苏常熟人。

1978年考入解放军测绘学院；1982年和1985年先后获该校工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88年作为国家公派研究生赴德国留学；1993年获德国汉诺威大学工程博士学位；1994年至1998年先后就职于瑞典耶夫勒大学、瑞典SWECO公司和瑞典皇家工学院；1998年获皇家工学院教授资格，同年获聘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TUM）地图学终身教授，兼任TUM航空摄影测量和地图学研究所所长，学术重点包括地图模式识别和自动综合、空间数据融合和挖掘、移动地图导航算法等；自1999年起陆续在各种校外学术团体兼任决策顾问，其中包括中科院首批海外评审专家、施普林格教科书系列《地理信息和地图学》主编之一、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参议会成员、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和德国地学中心监事会成员、洪堡基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同济大学和芬兰阿尔托大学校董会成员等；2006年至2014年先后担任TUM土木学院常务副院长和TUM常务副校长，主管国际关系和校友联盟；2011年和2013年先后当选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

1998年4月的一天，正在斯德哥尔摩休产假的我接到慕尼黑工大的来函，通知我获聘地图学教授一职的消息。当时我的儿子刚满月，初为人母的我正沉浸在手忙脚乱的育儿实践中，专业工具书暂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琳琅满目的育儿百科。当然，我不曾淡忘一年前我初尝竞聘教授的滋味，飞往慕尼黑工大试讲和接受面试的情景。那时离我在汉诺威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才4年多，这个资历用于竞聘C4级工程类终身教授职位显然太浅。若不是我的博士导师Dietmar Grünreich教授说服我试试看，为日后积累必要的“实战经验”，我自己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去参与的。既然是试试看，我对竞聘结果自然就没有抱任何幻想。在这样的前提下，对方抛来的“橄榄枝”实属意外。来函的落款日期恰巧是4月1日，使我不免疑心是对方借愚人节和我开的一个玩笑，可转念一想又觉得对方犯不着和我这种新手开国际玩笑。想着想着，我便开始慌神，像惹了一桩麻烦事一样感到手足无措。如果接招，我在瑞典安居乐业的构想眼看就要被打破。当时，我在瑞典最大的工程技术咨询公司SWECO已有永久职位，收入稳定，福利待遇也无可挑剔，因此，改变现状的愿望不强。可如果不接招，会不会留下不良印象，使对方认定是我在开国际玩笑呢？

犹豫再三后，我最终还是决定接招。很久以来我一直说不清楚当时为何那么大胆。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虚荣心？为了学术界的自由生活？还是应了无知者无畏的说法？好像都不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在回望自己的成长过程时才越来越明显地体察到，驱使我迈出这一步的主要动力来自我潜意识里一份挥之不去的民族自尊心，而这

份自尊心又缘起一段生活小插曲。

事情还得从 80 年代末我刚出国来到汉诺威的头一年说起。当时，我享有一份国家公派研究生奖学金，日常生活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不必到处打工，每天的行动轨迹基本都是宿舍和办公室两点一线。为了使业余生活不至于太单调，我时常利用周末搭车去柏林拜访自由大学的地图学教授 Freitag 先生。出国之前，我曾为 Freitag 先生在中国的讲学担任英文口译并陪同他参观过不少名胜古迹，他的学汉学的女儿正好和我同龄。我来德国后就很自然地成了他家的常客。每次到柏林，见多识广的 Freitag 先生都会义不容辞地带我参观柏林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有一次，我从柏林返回汉诺威的搭车机会因故取消了，不得不坐火车返回。我刚上车不一会儿，一位五十开外的德国妇女微笑着向我走来，问我是否允许她和跟在她身后的一位男青年坐在我身旁的两个空位上。我见那两个位子反正没人预订过，便点点头。两人落座后，妇人介绍说他们是母子俩，家住汉诺威近郊。那位男青年看上去年龄和我相仿，但有些智障。他一边向我憨笑，一边很有礼貌地和我握手，并一板一眼地向我告知他的姓名和业余爱好。我发现他说话时嘴巴有点像拧不紧的水龙头，不停地流口水。而他的母亲则好奇地问我从哪里来，到德国来做什么，是否想家，是否打算长久待在德国，等等。我已经记不清是如何回答她的，但对话过程很轻松愉快。火车快到汉诺威的时候，妇人拉着我的手诚恳地说她很高兴和我聊天，问我能否告诉她我在汉诺威的联络方式，以便改日带着儿子来看望我。我觉得对这样一对热情的母子不必设防，便

爽快地把我的办公地址写入她的记事本。

几天后，我竟收到了那位智障青年写来的一封信，内容很客气，介绍他的日常生活，信封上还歪歪斜斜地贴着一朵从画报上剪下来的小红花。这个青年居然会断文识字，他母亲一定为之付出了超常的艰辛，我心里这么想着，对那位和我有一面之缘的妇女顿时肃然起敬。过了几天，我又收到一封类似的信，信封上也贴着一朵小红花。接连几封信后，我被弄糊涂了，搞不懂这位青年写信的动机是什么，也不知该不该给他回信表示一下谢意。大概是对方等不到我的回音，那母亲着急了，亲自出马给我写了一封短信，直截了当地向我挑明，如果我愿意和她的儿子谈对象的话，她会帮我申请长期居留许可甚至德国护照。原来她是想和我做一桩在她看来两全其美的交易。这个设想虽无任何恶意，但当时正年轻气盛、踌躇满志的我却还是觉得像重重地挨了一棍。我对关于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会使弱势群体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说法和现象并不陌生。初出国门的我则强烈感受到了第四大差别，即国与国之间经济力量的对比。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我在一位普通德国妇女的眼里相当于海平面（C-level）以下的弱智一族，这也未免太伤我的自尊了。这么一刺激却让我明白：个人自尊心和民族自尊心并非相互独立。如果一个人的祖国还不够强大，他的个人智商在境外被系统性降格的遭遇在所难免。不过，心理的沉沦处也是产生深度的地方。我的脑海里从此有了一个叫做民族自尊心的条件反射区，一旦触动它，它就会提醒我一个经验公式：在异国他乡，我们至少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能获得和所在国的同行相同的待遇，

我们只有付出更多倍的努力才有望胜出。

如此推想，我离开德国和重返德国的决定必定都是那个条件反射区发出的控制信号了。接受教授职位相当于得到了一张深入大学运行体制内核的入场券。说实话，我当时真有那么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英雄气概。既然决心已下，我就立即调整人生计划，领导一个教学研究团队和养育孩子是同样崭新和长期的任务，它们像一架天平的两端突然明摆在我面前。慕尼黑工大校方考虑到我孩子太小，允许我推迟到年底才上岗，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内心的高度紧张感，使我比较从容地完成了由斯德哥尔摩到慕尼黑的搬迁以及孩子的断奶过程。

刚到慕尼黑工大的那阵子，我在心理上俨然像一位新过门的小媳妇，每天都忐忑不安地学着适应“新家”的各种陈规。人生地不熟，难免犯规，给资深同事们留下“不懂礼数”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第一印象。“很抱歉”、“对不起”是天天挂在我嘴边的口头禅。我的地图学专业隶属慕尼黑工大最早成立的工程建筑和大地测量学院（简称土木学院），该学院当时已有 130 年的历史，我的到来使这里 40 多位教授的队伍里首次出现了女性和外国人。双料的另类身份使我备受关注，各种例行会议上，无论我出席还是缺席都会引人注目，不用问，众人的关注里包含着不少好奇和疑虑，等待我用实际行动去满足、去消解。

话 语 权

出于工作和生活的需要，我换过几个语种。成年以后学新的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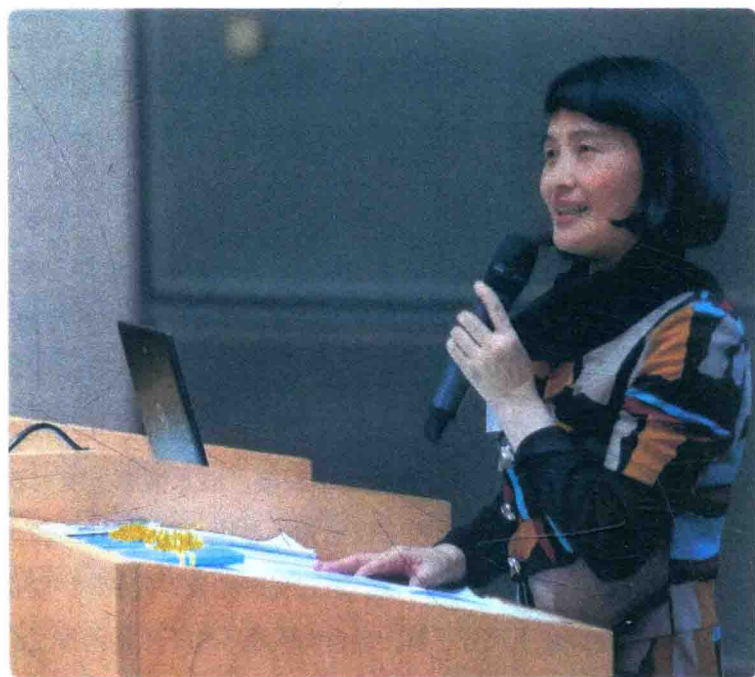


2010年，慕尼黑工大土木学院部分教授及管理人员（笔者为前排左二）

语肯定不轻松，我也不例外。每换一个语种，我感觉就像患了一次脑震荡，神经系统大面积错位。到慕尼黑工大入职之初，我需要一段适应期，将工作语言由瑞典语改回德语。土木学院里定期召开全体教授大会，讨论人事、财务分配方案、教研计划、国际合作和远景规划等大大小小的日常事务，可想而知，我的表达能力在一个个口若悬河的德国同事面前多么相形见绌。尤其是他们的一些语速极快又夹带各地口音的辩论更是令我目不暇接。根本插不上嘴的我，不得不正视自己的劣势，把教授会议当作熟悉语言和工作环境的机会，这样我至少可以不浪费知情权。通过观察和倾听使我对“各路诸侯”的性格特点多了几分了解，语言障碍也不自觉地消失了。

然而，我依然面临着难以获得话语权的尴尬。有时，好不容易轮到我张口，却往往话音未落就被打断了。相比之下，人家的发言

厚积薄发，从容不迫。而我由于文化背景和思维定势与众不同，表达的观点便显得不靠谱、不入调，像野路子的出牌方式，很容易搅乱传统的秩序，难怪有人不耐烦。我若就此妥协，势必很快会被“大众化”或“边缘化”，但这不符合我的“既不也不”立场。不尽如人意的现实激励我变被动为主动，格外珍惜每一次来之不易的发言机会，努力养成言简意赅、一针见血的辩论风格。实践证明，选词凝练和结构紧凑的话语不仅时效好，而且容易被记住，不容易被打断。



2012年，在慕尼黑工大一年一度的师生互助年会上致辞